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二二一）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八五期 ——  
（二〇〇四年七月五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407a）

【拨乱反正】“文革”中的“揪军内一小撮”问题辨析	何 蜀
【往事如烟】第一次大串联的回忆	钱文军
【研究提纲】文革历史研究的课题纲要	陈益南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拨乱反正】

“文革”中的“揪军内一小撮”问题辨析

• 何 蜀 •

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对这场全国性的灾难负有直接责任，因此目前中国的官方历史书籍或准官方述著对其中许多重要事件的表述常常语多遮掩，甚至扭曲事实，以尽量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形象。“文革”中以“揪军内一小撮”为口号而打击军队高级将领的事件，就是一个至今仍然扑朔迷离的案例。官方版本的介绍是，1967年这一事件发生时，毛泽东被蒙蔽而不知道真相，后来毛发现了就及时制止了这一行动。笔者通过对这一事件来龙去脉的分析，发现毛泽东其实就是这一行动的始作俑者，毛后来制止进一步“揪军内一小撮”的行动，是因为担心军队的控制权会落到林彪手中。显然，就象“文革”中的其他行动一样，毛泽东利用“革命”口号所发动的一系列政治斗争，无非是要打击他不喜欢的高级官员，以保持其个人对党政军最高权力的绝对控制。毛泽东的个人政治欲望把国家拖入了灾难的深渊，给中国的发展留下了浓重的阴影，其政治、经济、社会后果至今仍未消散。

◇ “揪军内一小撮”溯源

“文革”时期“揪军内一小撮”这一口号的完整说法是“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但国内关于“文革”的记述往往把其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字句省略掉，如此则整个口号的含义就大为不同。口号原文中矛头指向“走资派”的主要含义被模糊掉，听起来似乎这个口号只是把矛头指向军队。不过，为简便和通俗起见，本文仍使用“揪军内一小撮”这个简略说法。“揪军内一小撮”的背景是，当1967年“文革”发展到“全面夺权”和全面内战的白热化阶段时，在群众造反组织中出现了一种“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思潮和行动。后来，这种思潮受到“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厉申斥。凡参与过“揪军内一小撮”活动或有过类似言行的人，大多遭到清算，不少人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五·一六分子”。

其实，“揪军内一小撮”说法的源头，出自毛泽东亲自主持制订并亲笔修订的、1966年5月16日下达的“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明确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必须同时批判这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该文件还提到：“军队里也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笔者注：那时还未使用“一小撮”这个限制词），必须批判和清洗”。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一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明确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历来强调“党指挥枪”，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完全置于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军队。既然“文革”的重点是要整“党内走资派”，那么在军队任职的“党内走资派”也就必然面临同一命运。因此，“揪军内一小撮”实际上就是“揪党内一小撮”这一政治目标的必然结果和组成部份。

“文革”开始后毛泽东和“无产阶级司令部”一方面反复强调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即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始终不忘“揪党内一小撮”。但是，当“揪党内一小撮”自然地延伸到“揪军内一小撮”时，1967年8月，毛泽东和听命于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却严厉申斥、批判了“揪军内一小撮”的言论和行动。当时批判“揪军内一小撮”的一个理由是，军队不能乱。粗听起来，似乎有一些道理。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其中的矛盾：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能乱，然而领导军队的共产党却可以大乱特乱——这算什么逻辑？

“权威”说法质疑：林彪、江青要“揪军内一小撮”？

到底是谁在什么时候公开提出和宣传“揪军内一小撮”？

“文革”时期，为这一口号付出代价的不止一个人、一个政治“集团”。当“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揪出来后，官方曾说是这几个“小爬虫”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但当林彪外逃坠机死亡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官方改说是林彪炮制了这个口号。以后，当“四人帮”倒台时，又说是他们伙同林彪炮制了这个口号。不论罪名归于谁，似乎都与毛泽东无关，而且似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永远“英明正确”，而且全靠他“明察秋毫，力挽狂澜”，才刹住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歪风。

“文革”结束以来公开出版的有关“文革”史的著述中，谈到“揪军内一小撮”时，基本上都继续重复沿用了“文革”中一变再变的流行说法。即使是在否定了“两个凡是”之后，有关论著对这个问题依然沿袭旧说，而且含混不清。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中，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辞条是这样说的：“《五·一六通知》中，曾错误地抨击了所谓‘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1967年1月，林彪亲笔批示‘完全同意’关锋、王力等四人提出的‘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的口号。同年7月末，《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鼓噪：‘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彻底乾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于是，一些造反派就到各地‘揪军内一小撮’，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闹得乌烟瘴气。毛泽东发现后，批评‘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提法，才刹住这股歪风。”〔1〕

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说：1967年“7·20”事件后，“早在1967年1月就由江青等人拟定并经林彪批示‘完全同意’但又一直不敢公开的‘坚决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也利用‘7·20’事件的时机，在报刊上公开宣传，以致全国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2〕

这两例应该算是较为权威的说法。从上述说法中只能推导出以下结论：

第一，林彪支持“揪军内一小撮”，因为1967年1月林彪在提出这一口号的中央文件上批示“完全同意”。但以上两个说法对谁是口号的具体提出者却各执一词，一说是由“关锋、王力等4人提出”，一说是“由江青等人拟定”，而且上述两本书对这个口号具体文字内容的表述也不同。

第二，虽然有人（可能是林彪，也可能是江青或别的人）在1967年1月就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但“一直不敢公开”。至于他（她）或他们为何“不敢公开”，上述的“权威”著述就语焉不详了。

第三，他（她）或他们正式公开宣传这个口号的时间大约是在1967年7月底，通过《红旗》杂志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提出的。此后，才“于是”、“以致”有了全国的“揪军内一小撮”浪潮……

历史真是这样的吗？

到底是谁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

按照上述说法，“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似乎是“关锋、王力等4人”或“江青等人”提出的。其实，这两种表述在事实的认定上出入颇大，前一说法不含江青，后一说法也未必包含关锋、王力。由此可见，在当事人这个基本环节上，上述两本“权威”著述的说法是漏洞百出的。

更有趣的是，被称为当事人的王力后来完全否认了他参与其事的说法：“人们又说，1967年1月王力伙同关锋按照林彪、江青的旨意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提出彻底揭穿党内军内一小撮。这个宣传要点还拍成照片，铅印的名字有王力、关锋、唐平铸、胡痴，签名的只有胡痴一个人。这件事王力不知道。为什么要加上王力的名字？我也不知道。这时王力刚被任命为中央宣传组组长，唐平铸、胡痴是成员，关锋是总政副主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林彪委托关锋管《解放军报》。王力知道，过去不管谁领导中央宣传部工作从来不管《解放军报》。这个宣传要点王力连看都没有看过。关锋提到过这件事的过程，说这个要点是根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写的，但没有说要加王力的名字。我认为这个问题即使是胡痴签了名，也不应追究责任。而且这问题还应该进一步研究。因为《五·一六通知》上就有：‘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等等。《五·一六通知》的这一段话，是毛主席加的。这不是说得更厉害吗？怎么能责怪后来的这个宣传要点呢？怎么能把责任推到

四个人身上呢？”〔3〕

王力的这个说法值得重视。这一说法首次提到，“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是根据当时《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提出来的，与时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关锋确实有关，但关锋也不是自行其是，他说这个“宣传要点”是根据一次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写的。当时军委常委包括几位老帅在内，军委常委会议一般由军委秘书长叶剑英主持，而林彪平常一般是不出席这样的会议的。如果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确实作出了“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决定，那显然就不能说成是“关锋、王力等四人”或“江青等人”的责任。况且，在那个“宣传要点”上签名的胡痴和没有签名的唐平铸，很快就被揪出、打倒了，也属于被揪的“军内一小撮”，他们既非“王、关、戚”同党，又非江青集团中人，能把他们笼统说成是“江青等人”吗？显然不能。其实，只要把上述“宣传要点”和存档的那次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纪录对比一下，就真相大白了。这个简单的对比查证工作至今未被批准，其中自有原因。

根据“文革”时期那一阶段的有关史实来推论，毛泽东确实有“揪军内一小撮”的意图，而且作了切实的部署。最早公开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是1967年1月14日的《解放军报》社论，社论的标题是“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这篇社论号召：“要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还必须继续放手发动群众，还要经过激烈的斗争，冲破重重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是来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两面三刀，欺上瞒下，玩弄资产阶级政客的卑劣手法，抗拒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在这篇社论发表的前一天，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与江青之女肖力（李讷）为首的造反派在《解放军报》报社宣布造反、夺权，报社负责人胡痴随即被“打倒”。这篇公开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是造反夺权之前就写好的，还是夺权之后才赶写的，现在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对这篇煽动在军队内部夺权造反的《解放军报》社论，毛泽东不可能一无所知。

从下列文件还可以进一步看出，“揪军内一小撮”完全不是瞒着毛泽东的阴谋活动，而是贯彻毛泽东意图的安排，并从一开始就处于毛泽东的掌握中。

1967年1月26日，毛泽东对全军“文革”小组1月25日编印的《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要报》第5号刊登的“关于夺权的若干情况和问题”作了如下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反映群众提出，究竟哪些机关可以夺权，哪些不能夺权；夺了权的人们对待不同意见的群众应采取什么态度（应争取多数，不能排斥）。请加以研究。”随后，中央军委于1967年2月16日作出了“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4〕。中央军委这个文件的第一条列举了军队夺权范围限于哪些单位后说：“在这些单位中，哪些要夺权，哪些不需要夺权，要看党委领导存在问题的性质。如果领导权确实掌握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的，要坚决夺回。”〔5〕

中央军委的文件必须经军委主席毛泽东阅后才能签发，这个文件鼓动“坚决夺回”军队单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力，可以被视为在毛泽东指示下宣布“揪军内一小撮”的明文规定。

1月30日，毛泽东将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的报告批给林彪、周恩来：“此件值得一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分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6〕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毫不含糊地提到“军队内部”与其他各界一样无例外地“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这说明毛泽东确实认为存在着“军内一小撮”，应该把他们揪出来“彻底批倒”。

2月7日，毛泽东对西藏军区党委关于请示中央尽快对西藏军区领导人张国华等表明看法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叶、聂、徐各同志：请你们研究一下，张国华、周仁山、王其梅等究竟是好人、坏人，一二日内拟电告我，发出表态，是为至盼！”〔7〕

毛泽东批示中点名的王其梅时任西藏军区副政委。在这个批示中毛泽东要林彪、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判断西藏军区领导人张国华等人“究竟是好人、坏人”，结论倘为后者，那自然就属于“军内一小撮”了。后来王其梅就是被当做“军内一小撮”迫害致死的。

2月9日，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把“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的文稿送林彪审阅。报告称：“遵照主席在上次常委会上的指示，起草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今天上午召集32人参加的会议，进行讨论和修改。特呈上请审查批示。”林彪10日将此文件转报毛泽东。毛的批示是：“照办。如昨夜会议上有修改，照修改稿办。”军委于2月11日将此文件下发。〔8〕

该文件的第2条规定：“由军委决定已经展开四大的单位，除因必要暂停进行的以外，要继续充分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真正的而不是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团结大多数，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9〕

可见，“揪军内一小撮”实乃“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

#### ◇ “揪军内一小撮”波及全国各地

从上述中央文件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及类似提法是从1967年1月起就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并在一系列文件、社论中反复提出过。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顶峰的“文革”高潮阶段，时刻“紧跟毛主席”的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立即把“党中央、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战略部署”“落实到行动上”，从1967年初开始，引发了全国性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浪潮。〔10〕

1967年1月3日，军事院校“造反派”在北京召开10万人大会，“炮轰”叶剑英、陈毅等人，并计划在5日召开“批判叶、陈大会”。同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炮轰”聂荣臻。首都街头大量出现“炮轰”几位老帅的标语、传单。周恩来当晚与总参、总政负责人和中央“文革”、全军“文革”的全体成员接见了40多所军事院校的学生，说服这些学生放弃了5日的“批叶、陈大会”。

1月23日，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红色工人造反纵队”主办的《红色造反报》第5期发表了一组批判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的文章。

1月26日，福州地区红卫兵“红革会”及“首都三司”赴福州人员等，连续冲击“福州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还冲击福州军区，揪斗军队干部。

1月29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红卫兵“呼三司”几千人包围了内蒙古军区大院的南大门，静坐示威，要求拒绝支持“呼三司”的军区副政委刘昌作检讨，提出“刘昌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后来发生了军队枪杀示威学生的事件。

1月31日，西安召开批斗空军副司令员成钧的“西安地区空军院校、文艺工作全体红色造反者斗争三反分子成钧大会”。

2月4日，青海大学红卫兵贴出大字报“炮轰青海军区机关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字报表示：“不把其中的小贺龙、小罗瑞卿揪出来示众，我们死不瞑目！”

2月8日，广州中山大学“红旗公社”等学生组织，抗议广州军区逮捕军区机关“千钧棒”等军内造反派，于凌晨起到军区静坐示威，冲击军区。

2月11日，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等围攻成都军区，要求军区释放被捕的军内造反派及兵团人员。《八·二六炮声报》发行了“批判成都军区专号”，发表了“成都军区顽固推行刘邓路线大事记之一、之二”，号召“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

2月13日，广州中山大学“红旗”造反组织、珠江电影制片厂“东方红”造反组织、军体院等1,000多人在省中级党校举行“声讨广州军区镇压革命学生誓师大会”。

2月14日，昆明军区军医学校、外语学校、步兵学校、文工团等军队单位造反派与其他群众冲击军区机关。

2月17日，四川大学“八·二六”组织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等以“解放大西南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的名义，在成都人民南路广场召开了“砸烂以韦杰、甘渭汉为首的成都军区黑司令部誓师大会”。

4月4日与4月12日，北航“红旗”两度发表“打倒徐向前，炮轰叶剑英、陈毅的严正声明”。

4月20日，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红色工人造反纵队”主办的《红色造反报》第14期发表了“炮轰叶剑英，叫他靠边站”的文章。

5月23日，广西大学“革联”、医学院“闯”等造反派组织及一些中学红卫兵连续两晚冲入广西军区院内张贴“打倒韦国清”、“与拿枪的刘邓路线决一死战”等标语。

6月5日，广州中南林学院“红色造反者”组织发出“敦促黄永胜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投降书”，此后发表于6月14日的《红色暴动报》第9期。

6月7日至13日，“新北大公社福州联络站”参加了当地学生反对福州军区的绝食行动。

6月12日，浙江“省联总”一派在“打倒刘邓大会”上公开喊出打倒浙江省军区第二政委龙潜的口号。6月15日浙江省“坚决击退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联络站”主办的《反逆流报》发表了“龙潜35大罪状”一文。

6月15日，“首都红代会赴邕（广西南宁）调查组”发表了“就南宁一中六一三事件告全市革命人民书”，号召全广西造反派行动起来，“宣判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绞刑”。

6月26日，43个军队院校和军队文艺团体造反派组成的“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联络处”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斗争罗瑞卿大会，刘志坚、苏振华等陪斗。

7月1日，“首都红代会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赴渝人员）”发表了“关于砸烂重庆黑警司的严正声明”。

7月15日至17日，成都军区机关造反派连续召开批斗甘渭汉（成都军区第四政委）、韦杰（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大会。……

在“沸腾”的1967年上半年，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揪军内一小撮”的结果是，各地造反派组织纷纷向军队单位发起了冲击。

#### ◇ 1967年“7·20”事件之后：“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高潮

军队一向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本身也是“专政机器”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军队的领导人从来就没有经历过被群众冲击威胁的场面。因此，一些地方的军队领导人对冲击军队单位的当地造反派组织毫不犹豫地采取了镇压措施。然而，这些镇压措施却被毛泽东视为“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对抗“文革”，毛泽东决定打击这些镇压“造反派”的军队干部，这就导致1967年夏天“揪军内一小撮”的声势被推向了高潮。

1967年2月青海“造反派”冲击省军区后，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下令开枪镇压，令“造反派”伤亡惨重。血案发生后，3月24日，经毛泽东批准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该中央文件称，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205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最后宣布“赵永夫隔离受审”。〔11〕

5月7日，经毛泽东批准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点名批判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李井泉和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该中央文件同时将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第二政委郭林祥定性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顽固追随者”，从而点名打倒。〔12〕

7月20日，湖北省武汉市发生了著名的“7·20”事件。当时，武汉地区支持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被中央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认定为“保守组织”，认为支持“百万雄师”的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那时隐居在武汉的毛泽东以及从北京专程到武汉的周恩来，均要求武汉军区负责人陈再道、钟汉华改变同情支持“百万雄师”的态度。当代表中央的公安部长谢富治和“中央文革”的王力到武汉对武汉军区干部施加压力时，这种态度激怒了“百万雄师”的上百万群众，该组织举行了一系列抗议示威活动，甚至与谢富治、王力发生了肢体冲突。〔13〕

这一事件被“无产阶级司令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在全国报刊上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声讨宣传。原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被认定为这个事件的“策划者”和“黑后台”，而遭到猛烈批判。据王力回忆，7月22日，康生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同意在报刊上点名王任重、陈再道的名，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7·20事件以后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主要是那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以及主席在上海的指示，由汪东兴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总理（周恩来），康生向关锋传达，进行了布置，总理也向戚本禹传达布置……。”〔14〕

另据杨成武回忆，7月24日，他飞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还说，他同意北京采

取的措施。也就是说，他同意他不在北京期间，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在“7·20”事件上所采取的一切措施。”（15）

7月25日，毛泽东就“中央关于武汉7·20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一事批示：“林、周、文革小组及中央各同志：代拟复电如下，请讨论酌定。”毛代拟的复电中称：“7月24日20时10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16）

毛泽东认为“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并批准发表的武汉部队《公告》中，将“7·20”事件称为“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并称这个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该《公告》宣称：“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17）

毛泽东还审定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18）

这封信声称：“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19）这里明确使用了打击“军内一小撮”的提法。

按照毛泽东确定的有关“7·20”事件的宣传方针，当时报刊上连篇累牍的社论、文章都使用了“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1967年7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一文提出：“我们一定能够把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统统揪出来”。同日，《人民日报》的另一篇社论“北京支持你们”中说：“这次大会，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威风”。同日《解放军报》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你们”中说：“对于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要把他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7月27日，《解放军报》社论“乘胜前进——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中号召：“坚决打击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7月2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中称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猖狂进攻”。同日，《解放军报》社论“革命的新生力量所向无敌——再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中说：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决心掀起一个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向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大批判的新高潮”。同日《解放军报》的另一篇社论“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中说：“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7月29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中说：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决心跟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划清界限，坚决把他们打倒。”同日的《解放军报》社论“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说：“破坏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那里的代理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7月30日，《人民日报》社论“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万岁！”中说：“中国的赫鲁晓夫和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远没有冻僵的毒蛇。”同日《人民日报》



的另一篇社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中说：“被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操纵的‘百万雄师’，正在土崩瓦解。”

7月31日，《解放军报》社论“新的考验”向“犯了路线错误的干部”发出号召：“从实际行动上和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彻底揭露和批判他们的滔天罪行”。

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上述一系列社论之后，7月30日新华社播发了将于8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7年第12期的社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7月31日全国各大报均在头版刊登。《红旗》第12期有两篇社论。一篇题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文章称“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同期的另一篇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些家伙，还在垂死挣扎。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事实证明，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 毛泽东为什么突然停止“揪军内一小撮”？

由以上史实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辞条为了得出既定的结论，扭曲了真相。实际上，“揪军内一小撮”并非只得到了林彪的支持，毛泽东有关鼓励、支持“揪军内一小撮”的批示和他批准发出的有关文件，不是远比林彪那个“完全同意”的4字批示多得多吗？当然，说毛泽东对此事毫不知情也是错误的，毛泽东自始至终都是“揪军内一小撮”的指挥者。至于说林彪对这一口号作了批示后“一直不敢公开”，更是无稽之谈。该辞条为了掩盖1967年上半年“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部署”和“指示”，颠倒了时间顺序，把上半年全国各地出现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活动说成是7月末《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发表之后才发生的，这样的描述与历史真相显然相差太远了。显然，如果承认“揪军内一小撮”已经在1967年上半年持续闹腾了半年多，毛泽东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无法摆脱干系了——沸沸扬扬了半年多而没有被“发现”，岂不是太说不过去了吗？于是，就把“揪军内一小撮”的责任归罪于《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

既然“揪军内一小撮”是毛泽东的部署，那为什么在1967年7月底、8月初中央的党报、军报、党刊把“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推向一个新高潮之后，毛泽东突然又要求停止鼓吹“揪军内一小撮”呢？据王力回忆，1967年8月12日，毛泽东有了新的指示，说“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不策略。从此以后全国各级宣传机器才不再使用“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20）

而毛泽东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念头，据说与《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有关，他在这篇社论的提法中发现了问题。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上述辞条的说法是，毛泽东在这篇社论上“发现”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为此严厉申斥。此说非常可疑。“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并非首次出现在《红旗》杂志的这篇社论里，此前半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亲自修改审批的党中央、中央军委文件里多次用过此类提法。而且，在《红旗》杂志这篇社论刊出的同时，党中央机关报和军报都多

次用社论的形式提出过相同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而《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前都会将大样送毛泽东审定，显然，毛泽东当时赞成在报纸上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

1967年的第12期《红旗》杂志刊登了两篇社论，都提到了“揪军内一小撮”，但毛泽东只对其中一篇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不满。那么，毛泽东在这篇社论的文字当中究竟发现了什么“问题”呢？笔者对比了这两篇社论的内容，有一个发现：虽然两篇都有“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但“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这篇社论中有一个提法是题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的另一篇社论中没有的，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这篇社论除了回顾解放军40年来“在毛泽东建军思想指引下成长壮大的历程”，和毛泽东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即刘少奇）及其“在军队中的代理人”彭德怀、罗瑞卿的斗争历程之外，还用了相当多的篇幅颂扬林彪，大段大段地颂扬林彪对建立人民军队作出的贡献。这篇社论说，林彪“系统地阐明了和创造性地发挥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林彪同志提出的保持我军无产阶级性质的一系列重大措施，使我军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

据军队系统的“文革”研究专家王年一后来在书中披露：“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篇社论，指出要‘还我长城’。”（21）

毛泽东的不满究竟是什么？他批评的是《红旗》杂志那篇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还是该社论对林彪的颂扬？他的“还我长城”之语，针对的是谁？是奉命“揪军内一小撮”的王力、关锋、戚本禹，还是被这篇社论称为“直接指挥”军队的林彪？到底毛泽东关于这篇社论的批示有那些具体内容，迄今为止国内的有关论述都讳莫如深。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文革”时期许多无关紧要的批示都公开发表出来了，但却没有1967年8月间毛泽东对这篇社论的批示。在“文革”中批判王力时，红卫兵的大字报和传单、小报上倒是有所披露，但其说不一，有的说是批示的内容是“还我长城”，有的说是“打倒王力，还我长城”，还有的说是“打倒王力，打倒，打倒”……真有“打倒王力”的批示吗？1967年9月7日毛泽东在戚本禹写于9月4日的检讨信上批示说：“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之关、王二同志。”（22）

此批示仍称王力为“同志”，可见“打倒”之说难以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杨成武的一篇回忆录可以为这一段历史作注。杨成武回忆说，在他陪同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即“7·20”事件前后）期间，“有一次毛泽东讲起长征，并问我知道不知道有个‘会理会议’。我说知道，但会议内容不太清楚。他就讲了‘遵义会议’后不久，林彪曾写信给中央，要求他和三人军事小组下台，由彭德怀出任军事总指挥。所以才召开了‘会理会议’，批判了林彪，保证了党内、军内的稳定，并进一步肯定了北上的方针。”此外，毛泽东还对当时流行的祝颂语“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表示强烈不满。“在上海虹桥宾馆，有一天，毛泽东非常烦躁地说：‘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毛泽东还要杨成武回去报告周恩来，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要犯错误。“当时这些话，也仅仅是传到周恩来那里。由于林彪当时所处的地位，处理这样的问题，对于周恩来也是很棘手的。”（23）

毛泽东是在“7·20”事件后从武汉转移到上海住进虹桥宾馆的。他“非常烦躁地”说上面那段话的时间，基本上可以断定为《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发表（7月30日广播，31日见报）之时。从杨成武的回忆可知，这时官方媒体和社会上对林彪的颂扬已经使毛泽东十

分反感，因此他要求报告周恩来“不要宣传个人”（注意：当然不是说不要宣传毛本人，而是不要宣传林彪，不要再说祝林彪“永远健康”之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红旗》杂志1967年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对林彪的颂扬，很可能触犯了对军权高度敏感的毛泽东，他才作出了“还我长城”的批示。毛泽东担心的是，自己对军队的领导权被架空了，军队的“直接指挥”权会落到林彪手中——几年后毛泽东就明确说过：“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在毛泽东的这一批示的原文及真实背景尚未公布之前，笔者只能认为：“还我长城”的深意是“还我军权”；这里的“我”其实并不象某些“权威”著述解释的那样，是毛代表人民提出要求，而只是指毛个人的要求。毛泽东突然要求停止使用“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大概与他担心林彪借“揪军内一小撮”的机会巩固军权有关。

只要正视历史，直面现实，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宣传“揪军内一小撮”，还是批判“揪军内一小撮”，都是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在1967年7月底之前就已经持续闹腾了半年多的“揪军内一小撮”，毛泽东不是不知道、未“发现”，而是了解得清清楚楚，并且给予了明确的鼓励和支持。

看看从彭德怀到罗瑞卿等军队领导人的命运，看看“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的而不是经过剪裁的历史，就不难发现，毛泽东借口有人“揪军内一小撮”而批判打击别人，其实他才真正是“揪军内一小撮”的始作俑者。在整个“文革”时期，他在军内前前后后揪了若干个“一小撮”。凡让他不满意的人，都难逃被揪之劫。

注释：

（1）《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375页。

（2）《“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7月，第171页。

（3）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第291—292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201页。

（5）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出版，2002年。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209页。

（7）出处同上，第218页。

（8）出处同上，第226页。

（9）出处同上，第227至228页。

（10）这一节对当时事件的报道取材于当时的各种媒体，包括各地造反派组织出版发行的报纸（俗称“红卫兵小报”）。这些“红卫兵小报”的大多数可以在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2002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中查阅到。

（11）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出版，2002年。

（12）出处同上。

（13）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第260—266页。

（14）《王力反思录》，第1011、1927页。

（15）杨成武，《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第291页。

（1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80页。

（17）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8）毛泽东对该信作了如下批示：“退林彪同志酌定。我加了一小段。”此批示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83页。

- (19)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264、265页。  
(20) 王力,《王力反思录》,第291页。  
(21)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267页。  
(2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412页。  
(23) 《杨成武将军自述》,第304、306页。

□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1期(总第84期)

~~~~~

## 【往事如烟】

### 第一次大串联的回忆

• 钱文军 •

1966年七月底,我们几个活跃份子趁着传达了刘少奇、邓小平等讲话录音、也就是那个著名的“老革命碰到新问题”的讲话录音,工作队灰溜溜的时候篡夺了学校文革运动领导权。首先干的一件事就是不许批斗老师,四位被工作队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被我们“松绑”了,他们从此得以回家。其他老师也被允许自己组织“战斗队”,参加文革运动。但这个篡夺的权力没有行使几天,铁路局党委就及时粉碎了我们的阴谋。他们发现这几个学生居然全都出身于职员家庭,有的家长甚至还有历史问题。于是按照据说是“十六条”精神,成立了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校革筹”。一名原校党总支副书记,加上几名出身革干、工人的学生,领头的是干部子弟。

几乎选举结果刚出来,那位当选的“校革筹”组长就来表示关怀了。他原来是我负责培养入团的“对象”,铁路局一位处长的侄儿兼养子,所不同的是,这位处长大人来自山东老根据地,是个货真价实的老革命干部。我当时就觉得荒唐,如果革命已经蜕化到以血统的纯正确定权力分配,那么它离中世纪的贵族社会也不远了。

这位组长谦虚地请我继续协助他的工作,于是我马上让他要求铁路局派车分批送我校学生到桂林“取经”,因为桂林师范学院“八七事件”闹腾的挺热火,连王任重都来电报了。他立即请示,路局马上批复同意,派了几节加挂车厢,分批赴桂林。我当然在第一批。

在桂林,我又得到了包括“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内的一批《中央首长讲话》。马上返回柳州,下车就奔铁路局印刷厂,总共要求印刷一万余份各式传单,而且,回到学校就补开了一张证明。最多的当然就是那张“炮打司令部”的文字,印刷厂还主动配合加上了那个戴军帽的头像。

但我鼓动一批同学直接趴火车上北京的举动使我的那位“培养对象”有点恼火,他喜欢领导更多的学生,跑了一批就少领导一批。批评归批评,接着北京传来“破四旧”的消息,他又来问我该咋办?是不是也学北京的样抄反动派的家?我道不可,我们不知道谁是反动派,要是乱抄家,是犯法的。我们最好游行示威,表示对北京的支持就好了。他有所犹豫,但又拿不出什么主意,只好听从。

这一段时间,“校革筹”成了傀儡,我们几个继续在幕后操纵他们。于是就有反映,说“校革筹”是木偶,操纵他们的是“六六六战斗组”。这流言使“校革筹”的同学们无地自容,他们终于忍无可忍,集体到铁路局告状去了,据说那位组长还哭诉了许多我们欺负他们的故事。

铁路局副局长、“四清”工作总团团长亲自跑来学校，正式宣布我们这几个是“右派翻天”，我们就开始遭受讨伐。结果我的住校用具全被扔到宿舍附近的菜地里。那些忽然发现自己出身工人家庭的、天生是左派的同学马上激起了高昂的阶级热情，围攻起我们来了。

俺眼瞧风云突变，许多昨天还围着我们转的同学，立马倒打一耙。尤其是那位“四清”总团长宣布要我赔偿数百元印刷费用时，顿时觉得天昏地暗。但又不肯服输，于是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俺回南宁家里去算了。却不料这决定变成串联的开始。

回到南宁，满街都是“赤卫队”、“盾牌红卫兵”的标语，大抵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之类的，一片“红色恐怖”的迹象。我首先跑广西大学，我的初中代课老师有一个在这里不记得是当学生还是当助教的，寻得他不很难，因为他在学校挺出名。在他那个造反组织的办公室里，他继续对我发泄老师的尊严，却又说不出什么道道。

然后我寻到南宁二中，我的一个高干子弟同学在这里附设的航空学员班学习。见面果然不出所料他是“盾牌红卫兵”的干将。记得最清楚的是，当他带我到他们的司令部，进门就被问了一句：“什么出身？”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抢着先回答了：“（此处有不合适字符），当然是革干！”于是那个家伙就亲热地拍打我的肩膀：“好，红五类战友。我们的父辈打天下，我们不掌权谁敢掌权？好好干！”

其实我的心已经虚弱到底了，俺的真正出身算职员，充其量也是“灰五类”。一下子进入这个全都穿军装的群体里，那感觉就如同一只乡下土狗进了狼群。和我的同学说话还大声一点，跟别人说话我自己都觉得声音打颤。还记得他们在“盾牌红卫兵”里的职务完全是依据老爸的职务高低确定的，我同学的爹是地师级干部，所以他当“作战部副部长”。其实他完全知道我的真实出身，送我下楼时他告诫我：“好汉不吃眼前亏。再遇到盘查出身的，你就雄赳赳器昂昂地说‘革干’，千万别嘴软。现在的干部都是革命干部，难道还有反革命干部的？”

走在他们校园里，我看见两个女教师被剃了“阴阳头”，正在扫地。我问他：“你们怎么能这样侮辱老师的？是否太过分？”他的回答很妙：“现在人都发狂了，什么事情过火干什么。你要提出不同意见只有自己倒霉，还帮不了别人，算了，只当没看见。”

从二中出来，我去了医学院，那里有好几个我认识的学长。整个校园里到处都是辩论场，不记得他们辩论些啥了。找到一个学长之后，他拉我到僻静处，像是做贼，又像是地下工作者。一问才知道，原来他们这个“闯”战斗队现在正处于逆境之中。我高谈阔论了一回，他居然还不知道有那么多人激动的消息，甚至连“炮打司令部”也不知道，更别提毛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那封信了。我把刚从“盾牌红卫兵”司令部里拿来的几份传单，大抵都是中央首长也即江青等人的讲话拿给他看，他于是马上领着我找到另外几位“战友”，慷慨地招待我吃晚饭，当然是学校食堂里的学生餐。然后到了一个被改名为“反修楼”的地方，房间里一排排木架上摆满了浸泡着人体器官的玻璃瓶，灯光昏暗，场景十分吓人。然而我对这几位兄长神侃了桂林的见闻以及听来的各种消息，以及对革命造反的理解等。

几天以后回到学校，怀里已经揣着一张因私铁路免票。铁路职工每人每年都有两张这种免票，据说是“二七”大罢工时，从北洋军阀那里争来的权利，每年十二张。解放后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了，改成两张。其实根本没几个人用得起，因为每人的工资仅够最低生存消费，坐火车免费之外，出门还要花钱的。我父亲的免票就基本没用过，这次我缠着父亲总算开了一张到北京的私用免票，还有十元钱，以备万一。

果然，到了学校，气氛完全不同了。校革筹每天安排学习毛著，那几位老师又成了牛鬼蛇

神。据说还补充了一次“破四旧”，柳侯公园里柳宗元的衣冠冢也被扒开了，我们宿舍里还堆积了好几箱抄来的香水等奢侈品。幸好，我走前卷好的铺盖还原封不动在我床上，没有随“破四旧”之波逐流而去。几位同战斗组的战友都挺坚贞不屈，除开两位已经离去之外，其他人都顽强地坚守我们那个队部。

革筹开始按照铁路局的指示，分批派学生赴北京串联，当然首先必须出身工人或革干，其次是尊敬校革筹的领导，还要表现好。我们这个战斗组是没有资格的，我便寻校革筹论理，因为我们组里有一位同学出身工人，必须有一个串联的权利。革筹组长早已没有过去那种尊敬的丝毫表现，他毫不客气地训斥我无法无天私自逃离学校，但终于接受了我的要求，批准这位工人出身的同学串联去了。但我要求补发学生证却没有批准。于是我寻得学校人事主任，他给我出了个主意：贴一张照片，然后写上因遗失学生证尚未补发的证明，然后他骑着照片的缝盖了一个学校的公章。这时我发现原来做学生会干部积累的交情，特别是我篡权时善待老师的举措，此时赢得了回报。私下里，老师们对我都很友好。

眼瞧着我们日子并不好过，于是我要求我们战斗组的其他人干脆开免票出去串联，但没有通过。于是我宣布我必须出去，否则我们就是井底之蛙，根本不知革命的方向。大家同意了。学校推举去北京串联的同学大约有十几名，据说要到国庆节去接受毛主席检阅。俺自己先溜了，管他什么革筹威胁的处罚。？

上得车就发现，我那张免票根本没用。车上的学生们，基本上都是大学生，根本不需要任何票。他们都穿着军装，我后悔自己没穿那件旧军装来，那是在军区当职工的母亲买回来的处理品。还没来得及细想，几个京腔便传来了：“什么出身？”这几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大学生，如同查票一般查了过来。一进我们车厢就宣布不许阶级敌人乱说乱动，有几个笨蛋自己说是地主或资本家的，当即挨了皮带抽，还有一个跟他们论理，结果在下一个车站被赶下车了。查问到我时，我记得同学那番教诲，理直气壮地大声吼道：“革干！”他们马上友好地笑了笑。

火车终点站没有到北京站，在永定门就驱赶所有旅客下车，说是只许空车进北京站。我第一次到北京，根本不知道该到何处去，出站就看见几排桌子，挂着的布帘上写着外地革命师生接待站的字样。还有一个桌子前注明“铁路学校革命师生接待站”的字样。我斗胆前往，人家要学生证和介绍信，我没有介绍信，学生证也是那张纸。灵机一动便称这就是介绍信，人家狐疑了一会，并没有多说，给了个卡片，叫到铁路七小去，还告知坐几路公共汽车。于是我记住了北京除长安街、王府井之外还有一条南礼士路。

上公共汽车前，我看了一下那张“外地革命师生乘车证”，背后印着的字还记得有郊区长途公共汽车无效之类的。到了铁七小，教室都成了宿舍，有的用课桌拼成床，有的只是在地板上铺的大通铺。领饭票时，我只管说既无钱也无粮票，他们居然没多说话同样给了五天的饭票，然后告诉我，到期必须离京。

第一次到北京，什么都新鲜，到处逛，也没少跑北大、清华等院校去看大字报，甚至抄录了不少。几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再领饭票时人家不肯给，俺只管死乞白赖，理由非常冠冕堂皇：毛主席还没接见哩。终于又领到了饭票。

世界小的时候真的很小，那天去王府井，居然碰见我们学校的那批“红五类”赴京团。多数人都很友好，校革筹组长可不客气，干脆直接地命令我回学校，否则后果自负。经过这么些天造反精神的熏陶，我也根本不会理他，理由依旧冠冕堂皇：谁也没有剥夺我接受毛主席检阅的权利。甚至反唇相讥道：你干嘛害怕我见到毛主席？

国庆节很快就到了，那天最多凌晨三点，我们就被叫起来，吃过早餐之后，等来了许多大卡车，直接拉到东单北大街那处地方，傻瓜一样排开坐地。然后各路神仙开始唱歌，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等得好着急”，“一二三四五，我们等得好辛苦”，就是在这漫长等待中拉歌的刺激。

俺平时路过看见路边人行道上那些铁盖，老是琢磨不透它们等距离排着究竟为什么，此时发现它们被围起来成了临时厕所的蹲坑。也不知究竟何时开始检阅，长安街上的队伍没完没了，待到我们的队伍可以行进上长安街，我已经腰酸背疼腿脚麻木了。看见不少人都有小红书，我非常羡慕。手里有个东西摇着怎么说都比赤手空拳晃悠强，于是发誓即使偷也得弄一本。终于走到天安门前，欢呼声震耳欲聋，兼之高音喇叭里不停放送着的进行曲，说是什么的海洋都不过分。

我看见高高的天安门上立着许多人影，挺费力才辨认出正中间那个就是毛主席。没料到他老人家看见我们就转身往回走，后边跟着那个瘦小的林彪。队伍里不约而同地着急了，呼喊声一下子高了几个八度，节奏也快了许多。眼看着那两个人的背影就要进城门楼去了，我们的整个队形不知怎么的就散了，我也弄不清是自己跑还是被推着走的，很快就到了金水桥前边不远的地方。广播里不断发出命令，但是没有人理会。我看见前边几排被一个角钢焊接成的方截面构件挡住了，那构件活像倒下来的塔吊。

天安门上那两个人影似乎被感动了，回转身子向我们招手。万岁之声立即像涨潮一样激烈起来。直至此时，我才感觉透不过气，前后左右人群挤得只能随波逐流。未几，忽然感觉背后有某种温柔，扭过头来才发现是一个狂热的女生，那压迫必定是她饱满的胸膛吧。想到此不由得脸热心跳，于是思想就开了小差。不知何时老人家已经不见了，在一大队赶来维持秩序的大兵拉扯之下，这些无奈的学生们终于离开了金水桥前，后边的队伍撕破嗓门拼命喊，只可怜他们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什么光辉形象也没看见。

往西去的队伍已经不复存在，走了一阵看见许多学校接待站送饭的卡车，我感觉到腹中在闹腾，只是没有俺们吃的份。脑子里不时回味那拥挤时的压迫，真该感谢他老人家，让俺早早领教了一回异性的温暖。此时已经下午大约四点了，我们住在南礼士路真还算命好，回去就可以狼吞虎咽甚至可以休息。晚上还有焰火节目呢。

没多大会儿，我们战斗组的王肥来了，他是官方派来的，住在北蜂窝，顶不住饥渴干脆到我这儿来了。我到食堂费尽口舌给他弄来俩馒头加一碗菜，他边吃边诉苦，原来他属于那些起大早赶晚集的，啥也没看见，白走了老半天。

我们接着商量回去的事，他们第二天就要集体回校，正不知如何办。我告诉他没必要理会，凭学生证可以到接待站领返回原地的火车票，然后到东单体育场换票，去哪儿都成。夜晚又集合，我们排在西单路口一带，席地而坐等着看焰火。小地方长大的，真的还不知焰火啥样。看着离天安门甚远，于是想往前赶，没走出多远就被纠察队拦下了。这些纠察也是北京的红卫兵，吼两句你不听他们就扬皮带。那些皮带都是彭德怀时代发给军官的，厚实的铜皮带扣让人不得不听从指挥。焰火放起来了，广播里说老人家下到金水桥前边了，看了焰火，开了眼界，王肥回他的住地，我也回南礼士路。

次日领了革命师生乘车证，只给回原地的。我跑到东单体育场，换票的人多了去了，我拿着回南宁的票没几个人知道那是啥地方，不肯跟我换。后来我改口告诉人家这票可以到桂林，顾客立即多了起来。我挑了个去青岛的换了，只是老也等不到王肥，我想，他大约被挟持回学校去了。

到青岛，我先跟着接待站安排的汽车到了省总工会招待所，招待所安排了床位，看来比北京强多了，四个人的房间目前只有我一个人，清静整洁。我把简单行李扔在靠窗户的一张床上，就去看姥爷姥姥，真的很想念他们。姥姥见了我眼睛都笑成一条缝，接着她又叫表弟去告诉附近的舅舅、姨妈，免不了一番亲情倾诉的热闹。

入夜时分我回到招待所，到房间门口就愣住了，怎么房间里来了三位女将，其中还有一位正在洗头。我怀疑走错了门，但分明看见我的行李还在那张床上。一番笨拙的解释与说明，那三位看来是大学生的女将哈哈大笑，那位用毛巾弄干头发的还调戏起我来：“小老弟，你还是中学生吧？没关系，当一次洪常青算了。”我有点狼狈地捡起我的行李，赶紧跑到另一栋小楼的值班室，值班的胖大嫂也哈哈大笑，完了反而责备我：“你跑哪儿去了，那里改成女学生住的了，找不到你。改去五号楼吧，喏，换把钥匙，快过去吧。”

次日到处走走，青岛似乎没有北京那么热闹，人们的革命热情似乎不如北京那么高涨。我一个人行走在蔓延十几公里的海滨，无数别墅形状各异，显示着不同的风格。忽然有一个感觉：它们的庭院连围墙都绝无相同，联系到我见过市内的房屋，似乎青岛是没有相同的房子的城市。这个城市真是一个房屋建筑的博物馆。

坐在鲁迅公园的椅子上，看那无边无际的大海，听那此起彼伏的涛声，心潮也如涨潮落潮。我仔细想了我们这几个月来的经历，感觉似乎有点不大对头。如果连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那样的领导都不知文革该怎么搞，我们怎么可能知道？想起在家里时，父亲推心置腹的谈话，也有许多警示。父亲说，运动总是先动员你们大胆说话，最后就收拾那些大胆说话的人。凡是运动开始时积极的人，后来都要倒霉。他举了许多成为右派分子的人的故事，其中就有我认识的叔叔伯伯。

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我面前：我们最后会不会成为新时代的右派分子？在学校里已经有这样的吼声了，回去以后又会如何？但有一个问题却是明显的，北京的学生里，行为最过激的大抵都是一些干部子弟，特别是军队干部的子弟。他们的口号中明摆着就显示了“老子革命儿接班”的气概，有强烈的权力争夺意识。我们这些灰不溜秋的平民子弟，凑热闹是没什么大意思的，尚不得知这次运动要搞到什么时候，趁机玩玩也就算了。我在这个海滨孤独的思索，得出的结论就是回去以后就金盆洗手，如果运动还要继续进行，干脆躲回家去看书拉倒。

从青岛到南京很容易，因为接待站的人很轻易地就相信我关于从青岛到柳州必须经过上海的说法，于是车到南京我就下去了。列车上基本都是学生，主要是大学生。尤其是那些穿军装的学生，格外杀气腾腾，假如你要遇到“哈军工”的，最好别冒犯他们，否则就会“吃不了兜着走”。我在徐州火车站就亲眼目睹一个也穿军装、自称“革干子弟”的家伙。他与几个“哈军工”的争吵，最后暴露出他爹是地区武装部长之后，劈头盖脸挨了一顿军用皮带的抽打，直至他满头是血逃出站。

我到南京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王肥约定要到南京，这里是他的老家；二个是我不知怎的特别想参观一下南京大屠杀的纪念馆，直接地了解一些具体情况。前一个目的已经渺茫，因为在北京我们失散了；后一个目的我毫不怀疑。至于革命串联，除开北京到哪儿都是白搭，因此我不再考虑。

逛了紫金山、中山陵，那里的幽静肃穆给我太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那个音乐坛，太伟大了，我足足坐了好几个小时。假如在照片上看见，说是欧洲的某个地方我也不会怀疑的。又到了雨花台，革命烈士的种种事迹令我惭愧，怎么就想起“金盆洗手”来了？看人家革命先烈，视死



如归多么豪迈！激动过后仍忘不了打探南京大屠杀的纪念，于是询问雨花台纪念馆的工作人员。看上去他应该是一个负责人，很威严的模样。听过我的询问之后，他如同警察审视一个贼，良久才冒出一句话：“你打听那干啥？那是杀国民党的！”

看样子我再不逃走他很可能把我抓起来。我狼狈地逃走了，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南京依旧那么大，那么绿，那么美。谁还记得当年的灾难？政党的更迭居然可以抹去外敌的凶残，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也无法理解，更不敢表示不满。不过我敢于在心底里思考，我知道，我顶多是个假革命者，因为我竟然还敢思考。革命是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彻底的革命者就必须盲从，“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次日早晨，我还没醒，有人进来把我弄醒了。睁开眼睛一看，原来竟是王肥。他说是从总接待站的登记册上把我查到的，他离开北京就按照我的办法，逃出那个团体，到东单体育场换的车票，到南京已经许多天了。我们有了此番亲热的寒暄。接着商量到何处去的问题，几乎没有争议就决定到上海。我办理了离开的手续，拿着简单行李跟着他到了他的亲戚家，拿他的行李。于是没忘记问他的亲戚，结果是，人家从来没听说南京有个什么大屠杀纪念馆之类的地方。

从南京到上海，经过的是中国最富庶的平原。江南水乡风光确实美不胜收，待得我们到上海，接待站分配到复旦大学。生平第一次看见而且坐上有轨电车，免不了有种新鲜感。遗憾的是天色已晚，复旦也显得荒僻，大上海的风光很难领略。次日一早，我们俩起床，约定不理睬接待站的免费伙食，出去吃上海著名的“阳春面”。吃上嘴我们不禁相视而笑：除了葱花、油花之外，大约还有盐。

走过外滩、南京路，不知还有什么可玩的地方。商店多得离谱，走了王肥在上海的亲戚家，还是一个什么干部的，体会到上海的拥挤。那样拥挤的居住环境，居然还有那么多人迷恋，我们俩都不理解。离开上海的火车票竟然如此玄妙，我们俩都觉得不可思议：那位管发给火车票的说，没有什么柳州的票，给你们广州的吧，反正差得不远。

这样我们就乐不可支地在珠江边下了火车。出得站门口，接待站人头涌涌。看见那些卖香蕉的，散乱的香蕉每斤只买一角，王肥买了两斤。我们最终分在荔湾的一个居委会接待站居住。到了地方放下东西便出发，逛广州比逛上海有意思，至少风光好得多。在这个居委会的接待站里也感觉到格外的温暖，那些街道的家庭妇女成了工作人员，她们待我们就像待她们自己的孩子。广腔普通话至今还忘不了：“你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啦。”还有那可口的“盐水菜心”，以后直到现在，成了我到广州首先必点的第一道菜，在我眼里，这是粤菜第一名菜。

还记得我们到了黄花岗，那里的自由女神像已经倒在地上。粗大的拔河用麻绳扔着好几条，女神像基座上的献石，国民党三个字全被凿掉了，有几个工人正在用水泥填补。据说是周恩来指示必须恢复那三个字。空场上许多人依旧在为是否应该拉倒这座女神像而争辩，听说拉倒它的时候就吵得厉害，两派都是大学生，一派以华南工学院为首，另一派以中山大学为首，弄不清是哪派把它拉倒的，莫名其妙的是现在一提“红卫兵”，一提“破四旧”，谴责的舆论就冲中学生来了，谁也不去提及：所谓“五大领袖”，没有一个中学的毛孩子。其实，无论中学生或者大学生，“破四旧”的冲动都是谎言教育的结果，只有“举世混浊”，才能“惟我独清”；否认人类文明的积淀，方能凸现救星的神奇与伟大。一旦邪说被描绘成真理，灾难也就顺理成章。

还有一件趣事，那是在广交会的开幕仪式上。那时还围聚于珠江铁桥头的广场上开会。我们挤在外围看热闹。忽然在不远处有点骚动，原来是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胖女人，据说革命小将发现她是苏修集团的代表，更严重的是，她居然把神圣的代表红条子，别在连衣裙的腰带上！这是严重的侮辱我国尊严的事件，马上被几个穿军装戴袖套的揪住了。不过这个会毕竟

非同小可，马上就有更威风的大会保卫人员接管过去了，我们看见的场景是那个女人嘟囔着被簇拥进了会场大楼，这边也就风平浪静。至于里边会如何道歉，我们没法想象。

印象总是模糊的多，清晰的少，毕竟过去那么多年了。而且还有句名言：回忆是不可靠的。不过总的说来，广州比上海好玩。我们去了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中朝友谊亭、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山纪念堂外的草地（也许是个讽刺，因为怕“破四旧”，大门紧闭）、越秀公园等地方，就是没有去过任何一所学校，也没看任何大字报。唯一的例外就是，我们回到住地时发现，有一张“强烈抗议”的大字报，说接待站克扣伙食费，伙食太差。落款是上海某红卫兵战斗队。随后又有人在上边批了字：“上海佬，滚回去！”

从广州驱车，我们到了长沙，这是革命圣地，伟大领袖成长的地方。什么第一师范、橘子洲头、清水塘，都吸引着我们。当然也就涉足其间。印象深刻些的便是那个学校里的水井，牌子上写着：毛泽东同志在这个井里打水洗冷水澡。我笑道：我从高一就没有洗过热水澡了，可见英雄所见略同。王肥便讥笑我为东施效颦。

最不能不去的地方就是韶山冲，接待站必定安排车辆前往的。钻过那个挺雄伟的韶山渡槽，直到当时感觉非常新颖的毛泽东故居纪念馆，我画了好几张建筑临摹图，只可惜都无影无踪了。在故居里，我和王肥小声议论的话题就是：算不算地主。我们一致认为：中国90%以上的地主绝对没有这么大的房子。可是我们看见康生讲话里说主席家庭是普通农民，我们觉得，那绝对是拍马屁的捧场。唯独没法求证的是，土改时这个房子的主人是否也挨批斗。

在故居门前有一个池塘，只有塘中心还有尺把深的泥浆水。旁边立着的牌子上写着“毛泽东同志少年时期游泳的水塘”，竟然有几个特别“忠”的红卫兵小将脱衣下水了。看见他们踩着泥泞往里边走，我们俩都觉得不可思议。我想，旁边围观的人们一定也是如此认为，否则他们也该下去沐浴这个“圣水”的。惟可笑的是居然还有两三个女将。只见她们湿了水的白汗衫立即变得透明，于是手忙脚乱地拉扯胸前部分，使之不至于贴在身体上而原形毕露。秋天的天气已经有点凉，水肯定更凉。未几就有工作人员过来劝解，让他们都离开水塘。我们不解的是：难道还带了换洗衣服来韶山？

离开韶山到长沙，长沙的食品中，最难吃的就是米粉；留下好印象的是画了叉的“沙利文”点心以及一碗一角钱的甜酒，北方好像叫“涝糟”的。直到在火车站，王肥忽然发现我应该在韶山灌一壶水，我的行李中一直带着一个军用水壶。我们谈笑了一阵，就在车站开水桶接了一壶开水，管他呢，长沙水也未必不能算韶山水的。

火车一路进广西，到桂林北站时有卖柚子的。几个佩带“南京大学”校徽的学生下去买了两个，但不知如何下口。一位女生掏出手绢抹干净外皮，另一位戴眼镜的男生接过来就要咬，王肥忍俊不禁被他察觉了，挺谦恭地请教吃法。我们本来打算看笑话，此时便只能帮助他们剥柚子皮。那个眼镜宣布是他请教的功劳，抢过去又想咬。我们再次制止他，帮他们剥成片，那个眼镜还是急迫地抢过一片就嚼。苦涩使他马上吐出来，引起一片哄堂大笑。直到我们吃了一片给他们看，他们才弄明白这玩意儿吃起来有多么复杂。不过美味使他们赞不绝口。

回到学校，学校的形势已经有了变化，有一个必须遵守的“巴黎公社原则”，校筹的权威便不像原先那么神气。局面不似我们走以前沉闷，到处都成立了新的战斗组，藐视校筹的就不仅我们一个“革命造反战斗队”了。留在家里的大家嘴还扩大了阵容，新增加了好几个战斗员，不过基本上是初中部的女将。我们的回归使大家兴奋，顿时引起不大不小的轰动，许多人都跑来问长问短。

因为我们去过韶山，也就使更多的仰慕圣地者络绎不绝地找上门来探访，话题重复在伟大领袖青少年时代革命足迹的敬仰之上。那壶长沙火车站打回来的开水，被我们说成“韶山水”，于是有虔诚者把它绑上红绸带，举行了仪式排着队恭饮一口。我和王肥相约千万不能道破，否则会有大麻烦。尽管仪式上那水不够了，人家自己也掺了开水进去。精神的崇拜很快就转化为圣物崇拜，离开了愚昧的煽动，任何革命高潮都是不可能形成的。

我的所有宣讲，都离不开“串联”两字。最具诱惑力的蛊惑，就在于我带出去拾元钱还没用一半。进一步，我鼓动自由串联，其实校革筹并不反对串联，他们要求有组织、有计划地在他们批准下少量出去串联。他们把串联作为一种奖励；我把它当成一种权利，一种人人具有而且稍纵即逝的权利。他们要求有准备地学习革命理论和经验，不许游山玩水；我鼓吹不必理会人家的任何革命经验，那不适合我们。串联就是游山玩水，领略祖国大好河山的壮丽秀美。

还有一个当时很敏感的问题：校革筹只许“红五类”串联；我鼓吹不论“灰五类”、“花五类”还是“黑五类”，即使被工作队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们，都可以串联也都应该串联。

校革筹为了消除我散播的恶劣影响，特地组织了一次全校誓师大会，目标当然是声讨那条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个“战斗队”都上台表达了他们的誓言，我们的“战斗队”理所当然地推举我上台发言。说了多少空话已经没有印象，但我公开宣布：“现在的革命大方向就是串联。串联就是革命，不串联就是不革命，反对串联就是反革命！”立即博得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和口号声，这个煽动后来成为美谈。

召开大会时还神气活现的校革筹，散会时就已经灰溜溜的。第二天就成了过街老鼠，并立即被一个不甘落后的战斗队宣布“夺权”，并当众劈烂了那个公章。一个依据“十六条”规定的原则并已经铁路局党委批准的临时权力机构，到此寿终正寝。它其实是被“串联”两个字打倒的。几天功夫，整个学校都空了。

我躺在阴暗的宿舍里，回味着这始料不及的巨大变化，那份得意，大抵和列宁在十月差不多。

□ 摘自“华夏知青网”

~~~~~

【研究提纲】

文革历史研究的课题纲要

• 陈益南 •

（一）文革十年的全过程概况

文革并不是一件事，不是仅仅一场运动，之中，包括十年中的各个不同阶段的“小运动”。

如：开初的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运动、老红卫兵们的“八月暴行”、各地党政领导在群众中抓“右派、黑鬼”打“反革命”的浪潮、造反的兴起与夺权的状况、1967年至1968年的武斗、“全国山河一遍红”、清理阶级队伍、下放干部的五七干校问题、工人农民“宣传队”时期、一打三反运动、批陈（伯达）整风、抓五一六分子的运动、林彪事件、批林批孔运动、反派性全面整顿阶段、批邓（小平）反右运动、抓捕四人帮等等历史概况。

有人总想只用一句话来概括说明文革及其性质，这怎么可能呢？

文革整整经历了长达十年，比抗日战争的时间还要长，之中，更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参入者成亿，涉及到所有的阶级、阶层，人事情况错综复杂，各种事件曲折非常。若不纵观全局，弄清楚各种事件的来龙去脉起因终果，那无论用多么精辟的词汇语言，都是难以正确地评价文革中各种事件的意义与性质的。

## （二）文革中高层人事与事件及其发展概况

文革的进行，实际是由若干条“线”组成展开的。其中，“主线”之一便是高层的人事变动情况。

例如，整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事件；中央文革小组与中央“碰头会”机构的产生、整贺龙事件、整刘少奇、邓小平事件、所谓二月逆流的怀仁堂会议、七二〇武汉事件、王（力）关（锋）戚（本禹）事件、杨（成武）傅（崇碧）余（立金）事件、阎红彦张霖之等省委书记政府部长被迫害致死事件、陈伯达问题、林彪问题、康生称病问题、王洪文上台问题、“九大”、“十大”中央人事组成内情问题等。

这些史实课题，有些情况尚未解密，故无法得知详情。但对那梗概、那说法，总还是可以逐渐弄清的。

## （三）红卫兵运动研究

包括：红卫兵组织的兴起及情况；红卫兵队伍性质区别的情况及原因；老红卫兵问题；造反派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兴亡情况；

之中，清华附中由张承志等人首先发起成立的红卫兵、以及天安门上向毛泽东赠送红袖章的红卫兵宋要武（彬彬）；北京的“联动”红卫兵、西安的“红色恐怖队”红卫兵；以蒯大富为头头的“首都三司”红卫兵；写出了《中国向何处去？》一文的红卫兵杨曦光（杨小凯）等，虽都是红卫兵，但他们在文革中，各自的情况与性质却是互不相同的。

红卫兵的问题，现在大致轮廓已基本清楚，需要着力补充了解的是之中的详细情况。

## （四）造反派问题

对“造反派”这一概念，现在的人们，包括一些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实际上也都是不太清楚的，而往往将文革中凡是参加过群众组织戴过红袖章的人，若其做了坏事，便一律视其为造反派。这，其实是有很大的误会。

例如，红卫兵中有造反派，但造反派却并不等于红卫兵。

造反派的确批斗过人确整过人，但1966年八月前后整死了老舍等人，抄家批斗了民主党派人士与各位高级知识分子，打伤打死甚至杀害了“黑五类”分子等，却都不是造反派所为！因为，当时，还没有什么“造反派”。造反派的产生，是当年10月之后的事，而造反派有权力与实力首先可以批判的对象，还只是所谓“走资派”，而其时，则已是当年年底的事了。

造反派是如何兴起的？为何说造反派最初是因为自己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才奋而造

反了的？造反派都是由一些什么样的人组成？造反派在文革各个阶段中，都扮演了一些什么角色？

而文革，对于造反派的人们，到底是福，还是祸？

扫去蒙在造反派身上的种种“莫须有”，实事求是地评价造反派在文革中的是非，是文革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章节。

#### （五）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及其兴亡情况

从清华附中创立了红卫兵组织后，文革中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便纷纷产生建立。

对文革中群众组织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文革中派别的春秋战国时期。

之中，各群众组织的政治态度却是不一样的，主要有“保守”与“造反”之分，当然也还有中间态度的组织。

由蒯大富为首的北京“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与上海“工总司”是全国造反派组织的典型；

而北京“联动”与武汉“百万雄师”，则是全国保守派的代表。

还有一心一意只为自己那个阶层争取生存权的一些群众组织，如临时工合同工的“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司令部”、知识青年要求返城的“红一线”。

复员军人也有过一段单独建立组织的时期，他们也分保守与造反的不同观点，如保守的“八一兵团”与造反的“红旗军”。不过，这类组织存在时间很短，中央很快下令不允许复员军人单独成立群众组织，他们便都一一偃旗息鼓了。

#### （六）文革中极大侵犯人权、迫害公民的事件

这之中包括文革初红卫兵打杀所谓“黑五类”（“地、富、反、坏、右”身份的人们及其子女）的暴行；如北京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安红色恐怖队红卫兵的暴行。

文革中，如北京大兴、湖南道县一类悲剧：在农村的政权机构的支持下，一部分农民，公然成千上万的杀害地主富农等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大规模恐怖的血腥屠杀事件。

在文革中的“揪小邓拓”、“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抓五一六分子”等运动中，数以百万计的普通公民，从文化名人老舍，女共产党员张志新，到普普通通的青年遇罗克，都是这些事件的受害者。

常常有人指责文革是“法西斯”的再版。的确，就是这类暴行，在人们心灵上留下了太深重的阴影伤痕。全面的公布这些悲惨事件，对后人无疑是一震撼良心的警示。

不过，也应说一下，这些，并不是文革的全部。若以这些暴行做文革的代名词，那对文革的认识也就不完整了。

### （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末

1968年12月，数以千万计的红卫兵，身份被转换为一个新名称：知识青年。

知青下乡并不是从文革才开始，1955年河北省的邢燕子就早已做了知识青年下乡当农民的代表。但是，作为一个强大阶层的产生，“知识青年”队伍，则无疑是从1968年12月起，才形成的。

知识青年的故事虽已有了很多，但从文革、从红卫兵运动、从造反运动这些背景上来看，则仍还有很多事值得研究。

一个普通的县城教师李庆霖，为下乡知识青年的困境，上书毛泽东的事，似乎不应忘记；而“白卷英雄”张铁生的故事，也有详细澄清的必要。当时张铁生交白卷的原因，真正事实并不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反对读书学文化，而是反映了一批在乡认真务农的知识青年们，对那些不必务农却能凭种种办法回城上大学的现状而心理不平衡的个人激奋看法。当然，李、张二人后来发迹后的政治活动，则是另外的事。

知青运动中，还有一个分支，现在被人了解得很少，那就是到缅甸参加共产党人民军的那批人。那些人后来有的回国了，有的却长眠在异国，有的做过人民军的高级干部，还有一些，则是后来“金三角”的大毒梟。作为中国知青的一部分，人们不应忘记他们。

### （八）文革中基层政权的变动情况

文革十年，并非就只是“四人帮”横行的十年，更不是什么造反派掌权的十年（上海除外）。实际上，除了中央最高层，在省以下基层政权的变动是有过多次的。但是，有一个铁的事实：那就是，除上海外，大多数老干部（领导干部）在文革中，被造反被夺权下台的时间很短，不到三年；而有七年以上的大部分时期，仍是在位的掌权者，不论他是以党委书记身份，还是以革委会主任副主任的面貌。

解读文革，不认识到这一点事实，就无法正确认清很多事情。

当然，象彭真、薄一波、杨尚昆那样一囚禁就是十年的老干部，也是不少的。不过，相对全体，他们仍为极少数。尤其在省以下基层，老干部被关被囚十年的事，则是罕见的。

### （九）发现与展示文革中因思想而获罪受害的英魂们

虽然因思想因言论而获罪受到迫害的事情，并非是空前绝后而文革才有的，但文革中，对思想与言论的镇压，对中华民族优秀精英的镇压与迫害，的确是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高度”。

人们现在都已知道了张志新、遇罗克、王申酉等英魂，但是，是不是还有一些遇罗克式的优秀青年，仍被掩埋在文革历史的尘封中而未见天日呢？

例如，1975年，某市有几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有工人有教师，就被以“反革命集团”予以枪决与判重刑。而他们还在走进审讯室内，与预审官辩论的依据，却全部是马列主义的书籍，张口闭口的理论则是工人当家作主的巴黎公社精神。然而，文革结束快三十年了，这些青年人却仍默默地长眠在“反革命”的档案材料中。

研究文革历史，反省文革，为我们民族的英魂铸建思想丰碑的首要，便是要让他们一个也不拉的再现并屹立于历史的画页中。

#### （十）文革中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份量

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虽然从1957年的“反右运动”起，便日益下降。而到了文革中，更是跌落到地板的水平。因为文革首先的第一刀，便是从文艺戏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而1968年的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管理学校、进驻与管理所有属于上层建筑的文化科研单位时起，知识分子的整体地位，则再次被打压。这确是文革中知识分子阶层的真实历史。

然而，历史也应还其全貌。

文革中，知识分子并不是有些人以为的那样，就完全是一个象“地富反坏右”那样受压迫被专政的阶层。在文革中，知识分子整体上确丧失了其原有的优越地位，“知识”的优势条件也被无知偏见所抹煞了，但是，他们却还并不是社会的“贱民”，不是“专政对象”。尤其，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阶层，在文革中也是如此。有李达、老舍、翦伯赞那样遭迫害的知识分子，也有姚文元、蒯大富、杨荣国那样一度春风得意的知识分子。在群众组织的头头中，不论保守派，还是造反派，也都有着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参入。

文革后长期流传已久的，在文革中所谓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说法，将知识分子列为了“地富反坏右……”另册表之末位，以证明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是最受打击最受迫害的群体。

然而，这其实是一个编造的说法。

1974年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就不同意对某位知识分子排挤之事，所作的“老九不能走”一语，是借用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座山雕的一句挽留胡彪（杨子荣）的台词，将那位知识分子比喻为剧中的胡彪（杨子荣）而示意应重视知识分子。因此，这“老九”实为挽留意义的比喻，而不是什么阶级阵营的排行，不是“四类分子”“黑五类”称呼的延伸。

因此，全面地还原文革历史中的知识分子地位与形象，对如何正确发挥知识分子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而扬弃知识分子阶层的种种天生不足，相信只会有益处的。

2004. 2. 12.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